



飛行員的故事—永遠的上尉

王立楨

提 要

本文是摘自「飛行員的故事」第一集，該書係王立楨先生走訪多位飛行員之後，於民國94年出版，書中故事並不是講述軍中高階長官，而是一般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時所遇到的狀況。王立楨先生是覺得那些故事如果不記載下來的話，多年之後就沒有人知道那些人曾經為國人做了一些什麼，所以他到目前已經出版了四本「飛行員的故事」，記載了五十餘位飛行員的故事，本文就是其中的一篇。

1996年九月底在舊金山保釣大遊行的行列裡，有一位年已七十三歲的老先生，也隨著大夥兒高舉著中華民國的國旗，高呼著反日保釣的口號。這是他第二次為了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而走上唐人街的街頭，上一次是在一個甲子以前七七事變的時候，那時他還只是個初中學生，為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但家人稱為祖國的地方，他隨著中華學校的同學們站在唐人街的街頭向大家募捐，替祖國籌募戰爭經費。幾年之後，在年紀剛到可以參軍的時候，他又在家人的贊助下回到那陌生的土地，加入空軍，直接的為國效力沙場。

他，就是如今僑美中華民國空軍同學會的會長朱安琪先生。在談起當年回國從軍的那段故事時，兩鬢已經花白的他，眼睛再度的散發出興奮的眼神，因為他一直認為對日作戰的那段時間是他此生中最值得回憶的一段日子。

美國的憲法禁止公民私自參加外國軍

隊，違者將會被取消美國國籍。朱安琪當時回國參加中國空軍時，對這個禁令並沒有多加理會，雖然生在美國，但是他始終知道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為了自己國家的存亡，犧牲了美國公民權，實在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這和1996年中共在台海演習時，大批人爭先恐後的離開台灣的情況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民國初年的美國華人社會也和現在的情形大不相同，絕大多數的華僑都還懷著“客居”的心態，把太平洋彼岸的中國當成自己唯一的祖國，期待著能有衣錦還鄉的一天。所以下一代的教育也以中文為主，中國孩子們每天在當地學校放學後，都必須再到中文學校去修三小時的中文課程，再加上星期六還有五小時的課，每個星期中文學校的課程竟高達二十小時。在這種情形下中文學校的師資自然也是非常的被重視，許多老師都是專程的由國內聘請來的，朱安琪先生的父親朱忠存先生就是在民國6年，剛由北大畢



業的時候應舊金山北邊的Hanford中華學校邀請，由國內前來擔任該校校長。

朱忠存先生雖然是一個很傳統的書生，但是他卻對新的科技與事物也很有興趣。民國21年在他三十五歲那年，他加入了中華航空學校第一期開始學習飛行，那所航空學校是舊金山華僑們為了響應國父所提倡的「航空救國」的理念而設立的，校址就在如今的舊金山國際機場。

當時只有九歲的朱安琪隨著父親的學飛，開始對飛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曾站在跑道邊的草地上，仰頭看著藍天中飛行訓練中的機群在金山灣上翱翔，幻想著有一天也能和父親一樣的駕機遨遊長空。

中華航空學校第一期有二十名飛行生於民國23年畢業，當時中國空軍正在萌芽階段，極需飛行人才，因此有十一名畢業生於畢業後馬上回國投身於祖國航空事業。

第一期畢業之後，中華航空學校因為經費關係並沒有馬上續招第二期學生，一直等到民國26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開始全面對日抗戰之後，舊金山的華僑們再度的踴躍捐款讓該校重新開始招生，並鼓勵華僑子弟參加訓練行列，這時中華航空學校在培訓飛行人才的同時也開始訓練飛機維護人員。這一期一共有十一名飛行人員畢業，其中有一人回國加入空軍官校第九期繼續接受高級飛行訓練。

民國27年中華航校第三期開始招生，

年僅十六歲的朱安琪在父親的鼓勵下也加入了訓練的行列。因為當時抗日已經進入第二年，海外的華僑們也都開始了解這將是一場長期的抗戰，所以在中華航空學校受訓的學生們都抱著學成後將回國從軍的心態，非常專心的去學習每一項技能。

民國28年4月底，朱安琪和其他二十九位同學一起完成了飛行訓練而由中華航校畢業，畢業之後全體同學馬上由舊金山搭船回國參加抗戰，朱安琪因為高中還差一個多月才能畢業，所以暫時留在美國等高中畢業之後再隻身返國。

當時全美華僑在敵愾同仇的心情下都全力支援政府長期抗戰的措施，所以舊金山僑界知道朱安琪因學校課業的關係而無法和同學一同回國時，大家又湊錢替他買了一張汎美航空公司的機票，使他可以趕到香港和同學集合後再一道去昆明向空軍官校報到，當年由舊金山搭汎美的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回香港的單程機票是一千多美金，折合成目前的金額該超過兩萬美金！

民國28年6月中，朱安琪在舊金山金銀島(Treasure Island)的汎美航空公司的碼頭上¹和雙親道別，獨自一人踏上了回國的旅程。因為美國政府禁止公民在國外從軍，所以朱安琪在飛機上並沒有向同行的旅客說明返鄉的真正目的，反而飛機上的組員知道他也是飛行員之後和他聊的非常的投機，減少了不少旅途中的寂寞。

1 汎美航空公司的中國飛剪號是水上飛機，所以登機是在碼頭登機，如今金銀島上仍保有當年汎美航空公司的大廈及櫃檯。

飛機經過夏威夷，威克島，關島及馬尼拉之後，於六月下旬抵達香港。這號稱東方之珠的香港當時並沒有因為中日戰爭而影響到它的繁華，仍然是燈紅酒綠的在迎接著由四方湧進的各路英雄好漢。

朱安琪和同學們在香港會合之後，立即又開始了前往昆明的旅程。那時因為廣東省已被日軍佔領，無法由陸路直接前往，所以只得由海路先到越南海防，然後再搭火車經河內前往昆明。

民國28年7月底，朱安琪等三十位由美國回國從軍的准飛行員們終來到了中國的空軍搖籃，校園內精神堡壘上的幾個字：「我們的身體飛機與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給了他們那群人很大的震撼，這回是真要上戰場和敵人一拼死活了！

空軍官校對這群千里跋涉回國從軍的華僑們非常重視，特別將他們交給當時在官校由陳納德為首的外籍顧問們做資格鑑定，沒想到在飛行之前的體格檢查這一關，就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因為不符合中國空軍所訂下的空勤標準而被淘汰，結果他們被編入地勤修護部隊為國效勞。其餘包括朱安琪在內的十六人被編入官校第十一期開始高級飛行訓練，還有四人因技術尚未達到標準，因此被編入第十二期繼續接受初級訓練。

在開始飛行訓練之前，官校發現了一個以前沒有想到的問題，這群華僑學生雖然從小就開始接受中文教育，但是他們所說的卻都是廣東話，國語是一句都聽不懂。所以在編組的時候還著實的費了點心思，讓每一個華僑學生的組裡最少要有一人會說流利的廣

東話或英語，這樣才能幫他們了解教官的講解。

朱安琪先生提到這件事時還想起了件非常有趣的事，當時和他同一組的其他三人是：曾天培、李國安及也是由美國一道回國的黃文彬，因為曾天培會說流利的廣東話，所以就被校方安排成朱、黃兩人的翻譯。因為當時的教練機中沒有前後座通話的裝備，所以每次飛行下來之後教官才有機會將飛行中學生所犯的過錯一一的告誡學生，結果那時每人每天飛一次就得挨一次訓，但擔任翻譯的曾天培每天卻得挨三次訓！

在官校受訓的時候，日機還不時的前來轟炸，因此當時官校的教官們除了得擔任訓練飛行任務之外，還得在空襲的時候駕機昇空與日機作戰。朱安琪那組的教官譚漢男教官就在一次空戰中遭日機擊中而迫降負傷，親眼看著教官被三架零式機追擊時的悲慘景象，使朱安琪對日本軍閥產生了一層恨意，他發誓這些血債一定要用日本人的血來償還。

經過一年多的訓練之後，朱安琪終於在民國30年2月10日於空軍官校畢業，正式成為一個中華民國的空軍軍官。原本以為任官之後馬上就可以參加對日作戰的朱安琪，卻因為抗戰初期飛機耗損太快，部隊裡已經沒有飛機可以讓這群新的飛行員大顯身手了，所以十一期的畢業生就在成都見習了半年之後，被派到新疆的伊寧教導隊去接收蘇俄的E-16型戰鬥機。

民國31年的秋天，朱安琪完成了在伊寧教導隊的訓練，而被派到位於蘭州的5大隊29



中隊，開始正式對日作戰。在第一次駕著俄製的E-16型戰鬥機，對著日軍的地面部隊掃射時，他激動的幾乎流淚，因為他似乎看見了那群在舊金山唐人街的餐館中，窮年累世在廚房中工作的華僑們，將辛苦賺來的工錢毫不吝惜的捐出給他購買昂貴機票歸國從軍的情景，他們並不需要任何回報，他們只希望中國能站起來不再被人欺侮。如今他駕著戰機將入侵的日寇射殺在戰場上，雖然戰果不足以影響整個戰局，但是他卻覺得已經替那些萬哩之外的華僑們出了第一口氣。

當時因為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日本空軍大都集結在太平洋諸島與美軍作戰，所以在中國戰場上的日機較前幾年少了許多，因此朱安琪在那段期間多半是執行對地攻擊日軍或掩護我軍的任務。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美國對我國空軍的軍援開始以倍數成長，一批一批的新飛機由印度經駝峰飛抵昆明。隨著新式飛機的來到，空軍也由各部隊中甄選出一批優秀的飛行人員，將他們編入位於重慶白市驛的4大隊，讓他們來接收這批P-40新飛機，朱安琪就是在這個時候被調到4大隊23中隊。

日本的飛機雖然不再像以前一樣的在中國領空上肆虐，但地面的戰事並沒有稍為緩和。朱安琪在僅僅熟飛了P-40三個小時之後，就開始駕機執行支持中原會戰的任務，他記得那時他隨著領隊高又新在天剛亮的時候就由西安起飛，飛往洛陽支援我方的地面軍隊，為了能多帶一些彈藥，他們都只加夠來回的油量就起飛，攻擊完畢回到西安，掛彈加油後馬上再度踏上征途，有多少次他的

飛機在超低空對日軍坦克車攻擊時，被敵人地面炮火擊中，但是他都能很小心的將飛機飛回基地。

雖然戰事非常的繁忙，但是年輕的飛行員們總會找機會來輕鬆一下自己。就在一次放假回重慶的機會裡，朱安琪認識了在中國農民銀行任職的蔣有賢小姐；他當即為她美麗的容貌及善解人意的個性所傾倒，在隊友的鼓勵下，朱安琪對她展開了猛烈的追求；在那段期間裡隊上也隨著空軍傳統的團隊精神給他最大的支援，在不影響任務的情形下，盡量給他方便，讓他一有空就往重慶跑。

民國34年年初，4大隊繼P-40之後又換裝了當時最先進的P-51野馬式戰鬥機，換裝後沒多久朱安琪就被派到遠征南京的任務，那是自民國26年底南京失守後四大隊第一次回首都的任務，所以被派到參與任務的每一個人都非常興奮的全力以赴；在那來回七個多小時的任務裡，野馬式飛機以兩萬五千呎的優勢高度，由湖北恩施直奔南京，沿途的日軍即使有心攔截也無法飛到那個高度。等抵達目標區後，這三十多架野馬再以雷霆萬鈞的氣勢由高空俯衝而下，將停在明故宮機場及大教場兩個機場上的日機掃蕩一空。

那一年朱安琪不但在戰場上連連告捷，連情場上也是大有斬獲；經過一年多的交往，他終於贏得了蔣有賢的芳心，他倆於民國34年7月24日於重慶結為連理。婚後不到一個月，日本就在兩顆原子彈的壓力下向盟國無條件投降了。那時的朱安琪真是英華滿面，回國的初衷已經達成，也完成了終身大事，再下來的就將是為祖國的重建而努力了。

日本投降之後，朱安琪還一直隨著23中隊在四川待了幾個月，到十一月中旬才接到命令調防北京。由重慶經西安飛北京這一趟航程，本來該是非常的輕鬆，但沒想到這卻是一連串厄運的開始。因為天氣突變，由西安出發後沒多久整個編隊就進雲了，大夥隨著長機開始爬高希望能保持雲上目視飛行，然而當天的雲層高到兩萬呎以上，飛出這團雲又進入另一團更高的雲，飛了沒多久編隊就無法維持了，朱安琪的長機在發現一個雲洞之後一壓翅膀就衝了下去，飛在後面的朱安琪還沒來的及跟著下去就又衝進了一簇厚雲，煞時他就變成一個人單機的雲中盲目飛行了，剛開始時他著實的嚇了一跳，但很快的就鎮定了下來，他將飛機先改成平飛，然後開始將以前所學的儀器飛行把勢全用上了，飛機在他小心的操縱下竟能脫離險境安抵北京。那天由西安出發的飛機中有半數因迷航而出事，就連長機也因迷航油盡而跳傘，那次調防任務竟是朱安琪在空軍作戰幾年當中損失最慘重的一次任務。

在北京沒待多久，23中隊就開始了勦共的任務，那真是一種新的戰爭，抗日時日本佔領的地區雖大，但是日軍卻都是在幾個重點都市，所以作戰起來目標明顯，而共軍卻是滲透在鄉下，混在一般老百姓當中，所佔的是一個“面”，這樣打起仗來不但目標模糊，而且新式的武器也無法發揮足夠的功能。這種作戰方式不但讓當年的國民政府打了敗仗，後來在韓國及越南的共軍也以同樣的手腕讓美國吃盡大虧。

民國35年初夏，23隊少尉飛行員陳燊

齡在保定附近對地攻擊時被敵軍地面炮火擊中，迫降於我陸軍陣地中，當時該陸軍單位也被敵軍包圍，為了營救戰友出險，朱安琪自告奮勇的駕了一架L-5輕型小飛機飛到那個陸軍防地，冒險的將飛機落在一個比足球場還小的地方，將陳燊齡少尉營救出來。這個驚險的任務不但救出了一位戰友，也替國家救出了一個日後的傑出領導者，陳燊齡少尉於四十餘年後在台灣成為國軍的最高指揮官——參謀總長。

救出陳燊齡少尉之後沒多久，在一次單機支援石家莊守軍的任務中，朱安琪自己也被共軍的地面炮火擊中，當時他的高度已不容許他跳傘，他只能將飛機對準附近唯一的一塊平坦農地落去，雖然那次迫降非常的成功，他也沒有受到任何的傷害，但是因為當地已在共軍的控制下，所以迫降之後沒多久朱安琪就被共軍俘虜了。

當共軍知道朱安琪是回國從軍抗日的美國華僑後，頓時對他另眼看待，每天都安排幾個幹部來和他談話，希望他能加入共產黨，為“新中國”的航空界努力，但是朱安琪卻不為所動，只要求早日釋放好能回家和新婚的妻子團圓。

朱安琪在美國的家人知道他遭敵擊落被俘之後，非常的著急，他們動用了所有可以用的上的關係，找美國國務院，找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希望能以美國政府的力量來促成他的釋放。

美國政府先以朱安琪已喪失了美國國籍而拒絕插手這件事，但經過朱忠存先生與國會議員們連絡溝通後，美國政府終於以個案處



理的方式來看這件事，首先他們以朱安琪是加入同盟國的軍隊對軸心國作戰為由，而批准了恢復國籍的申請，繼而下令駐華大使全面營救為共產黨所俘虜的美國公民朱安琪。

當共產黨發現朱安琪沒有投靠的意願，同時美國政府又插手干涉此事時，決定給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個面子，而將關了兩個半月的朱安琪送到天津釋放。

釋放之後回到4大隊，接到的第一個命令是即日起調為附員，停止一切飛行任務。這對朱安琪來說不啻是青天霹靂，雖然大隊長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剛被敵人釋放，身心都需要休息，因此暫時安排他休息一陣子再說，但是他看到其他被俘歸來的飛行員被冷凍的情形，知道他在中國空軍已經沒有前途可言了。

也就是這個時候，朱安琪收到了他父親的來信，朱忠存先生在信上告訴他回國從軍抵抗外侮的使命已經達到，做為一個炎黃子孫他已經盡到了他的責任，現在該是為自己的前途著想的時候了，大家都希望他能帶著妻子回到美國來。

既然在空軍已經沒有發展的機會，父親又催他攜眷返美，於是朱安琪向空軍總部提出了退役的申請，當時因為空軍成軍只有十多年，許多章程還不盡完善，而且一般飛行員都還沒有達到退役年齡，所以一時空軍總部還不知如何處理這件事。當時的總司令周至柔將軍很了解朱安琪的情形，但是在無“法”可循的情形下他也只能指示暫時以「停薪留職」的方法來處理這件事。

既然是「停薪留職」，所以就沒有退休金的問題，因此朱安琪在離開空軍的時候一

塊錢都沒拿到，連回美國的機票錢都還是由美國家裡匯來的。

回到美國之後，朱安琪因為沒有在美國軍隊中服役，所以不能享受任何退伍軍人的待遇，因此就連重回學校上大學都還要自己半工半讀的賺取學費，然而他並沒有任何的怨言。在祖國危急存亡之秋，他回國從軍是為了盡一個中國人的義務，雖然在法律上來說他是一個美國人，但是他知道他血管裡流的終歸是中國人的血，為了中國的生存而讓他喪失了一些在美國的福利，他認為是絕對值得的。

雖然他在中華民國空軍只服役了七年，但他始終沒有忘記在空軍的點點滴滴。由1949年起，在每年的8月14日他總會邀上一些當年一道回國投效空軍的夥伴們一道聚餐來慶祝空軍勝利紀念日，後來因為參加的人越來越多，這個原先非正式的組織竟演變成今天擁有三百多會員的僑美中華民國空軍同學會。幾年前這個組織和灣區的大鵬聯誼會合併之後，他又被推為這兩個聯合組織的會長，而他也就一直義務的為舊金山灣區每位空軍退役袍澤服務了四十多年。

當筆者問起他，為什麼在離開祖國近五十年後還是那麼的熱衷於空軍的事務時，他笑著說：「別忘了我在空軍只是停薪而已，我仍然是中華民國的空軍上尉呢。」

作者簡介

王立楨先生，紐約市college of Aeronautics 航空系畢業，康乃迪克州University of Hartford 電機系畢業，加州Santa Clara University企業管理碩士。曾任職於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太空部門，擔任流程總工程師。